岁月留痕

——摄影家郎琦访谈录

蒋蕾 撰写



吉林人民出版社

前　言

郎琦是一位经受过战争洗礼的战地记者。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冒着枪林弹雨，用生命去拍摄，留下大量珍贵的战争影像。可以说，他既是幸存者、见证者，又是意志坚定的胜利者。郎琦 1946 年参加革命，1948 年任摄影记者。1953 年，他带着“三等甲级”伤残证从朝鲜战场归来，同时带着痛失亲人的悲伤（他唯一的亲弟弟牺牲在朝鲜前线），也带回了战火中拍摄的大量作品。

郎琦 1958 年参与创办了《吉林画报》，先后拍摄了大量反映吉林省社会主义建设的照片。他几十年如一日地拍摄长白山之美，在人迹罕至的长白山密林，拍摄了诸多的“绝版长白山”。1985 年，郎琦率先以航拍方式表现长白山，他的代表作《云涌天池》至今仍是长白山摄影中一座无法逾越的美学高峰，是一张永不磨灭的“吉林名片”。

摄影是瞬间艺术，但郎老的作品却是“厚积薄发”。他的成功，源于超乎寻常的扎实深入和始终不懈的求新寻变。在吉林省摄影界，郎琦是一位慈爱长者。几十年来，他无私关怀着几代摄影人的成长，很多摄影人都受过他的帮助、关心和指点，并且成为享誉全国的摄影名家。如今，郎琦已 93 岁高龄，1999 年他患上胃癌，胃被切除五分之四，但他仍在摄影中走过了 20 年跋山涉水的抗癌之路。

目　录

一、军人父亲 / 1

二、摄影学徒时期 / 2

三、参加革命 / 4

四、东北画报社摄影训练班 / 8

五、拍北平入城式 / 27

六、痛失弟弟 / 38

七、拍摄南下工作团 / 40

八、人民志愿军随军记者 / 54

九、带着创痛回国 / 80

十、创建吉林画报社 / 82

十一、在“五七干校”劳动中拍照 / 142

十二、以长白山为一生的创作母题 / 150

十三、整理照片，总结一生 / 170

郎琦年谱 / 180

后记 / 186

访谈时间：2015 年 8 月 31 日、9 月 2 日
　　2019 年 3 月 18 日、4 月 8 日
访谈地点：长春明珠小区郎琦家中
访谈及整理：蒋蕾
协助拍摄：李剑、刘紫涵（2015 年）
　　荆宏、孔妮娅（2019 年）

一、军人父亲

问：郎老，我看到资料说您的父亲曾在张作霖的部队中当连长，是吗？

郎琦：我父亲叫郎文焕，在张作霖的部队中担任连长，原籍珲春[1]。我家是满族，珲春的郎姓有两支——大郎、小郎，我家是大郎那支。

我家有个故事。我有个叔叔，听老一辈人讲，他是参加孙中山的部队闹革命的。张作霖的部队让我爸爸去抓我叔叔，他能去抓吗？我叔叔就跑了。后来我叔叔死在牡丹江。这是我小时候听说的，没有考证过。

问：“九一八”之后，您父亲的情况怎么样？

郎琦：到了伪满时期，父亲所在的部队被改编。大约一年后吧，父亲离开军队。本来他还攒了一些钱，但他让一个信任的通信员去取，钱被这个人拿跑了。所以我父亲就没有职业，



图为郎琦父亲郎文焕

1. 据 1927 年成书的《珲春县志　世家》记载：“ 郎姓，原系库雅拉部扭呼勒氏，世系陈丁。达巴库道奇、沙扫奇、沙德勒、苏楚布什、赛布哈等曾任佐领……郎文焕现任陆军连长。”（转自《珲春史志》，李澍田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年 12 月，第 537 页。）

也没有钱，全家人靠一点点积蓄，生活很难维持。

我们家住在安图县松江镇，那是一个很偏僻的小镇，站在县城东头儿喊一声，西头儿都能听见。那是长白山下的第一个县城。我和我弟弟念了 6 年伪满小学，从“国民优级学校”毕业。安图县城没有中学，上中学必须去延吉。我们家经济困难，没有办法去上学，我们俩只好去当学徒。

二、摄影学徒时期

问：听说您在照相馆当学徒？

郎琦：经我父亲朋友介绍，我到延吉的兴隆照相馆学摄影。弟弟比我小 2 岁，他到一个表铺去学修表。

我当学徒一共 4 年，有合同。这 4 年里，老板供吃供住、供生活穿用。我呢？打水扫地等生活杂事都归我。那时候室内没有自来水，得到外面去打水，冬天打水时洒得棉裤上都是水。我还帮老板种点儿地，老板种地是为了自己家吃。

兴隆照相馆在延吉和龙井一共有两个店，我除了干杂事，还负责冲洗照片、送照片。每当学校毕业的时候，照相馆就去拍毕业照，我跟着他们到乡村拍毕业照，回来把照片洗好后，半夜给学校的老师送去。

那个照相馆，现在来看也很简陋，设备就是一架照相机、一个木质暗盒；拍照用的也不是胶卷，是把玻璃片的底片装进去，屋里有几个灯，弄块玻璃。操作很简单，要是告诉你，你 10 分钟就能学会。按快门就行了。（每次拍）光线是一样的、快门是一样的。拍的时候，用黑布把头蒙上，对对焦距，一按快门，然后就到暗房里冲洗。暗房是一个很简陋的木板房，把底片换了，把玻璃片放到盆子里冲，冲完了就洗照片。我不能



图为 1943 年郎琦在延吉龙井的兴隆照相馆当学徒时拍摄的。拍这张照片时，郎琦戴的帽子是他跟照相馆老板的儿子借的

学照相，只能干零活。

另外，我还学修照片。现在都是电脑修片了，可那时候，玻璃片上要是有褶子或者有啥毛病了，都得用铅笔修。用一个木头板，上面有个窟窿，下面搁个灯，把底片玻璃片放在木头板上看，哪里有毛病就用笔修哪里。修底片很累眼睛，我的眼睛到现在都不好。

伪满时期当学徒很苦，高粱米粥也不够吃饱的，要是能吃顿豆腐就算改善生活了。我也不懂事，给家里写信说吃不饱。我父母把苞米面烤熟了，也没有用油，烤硬后托人捎来。从安图到延吉有好几百里路，吃这个能改善一点。伪满时期，豆腐也不是随便就能买的，要“配给”。正好卖豆腐的和照相馆挨着，有时候可以买到点豆腐。

学了 4 年后，我出徒了，就回家了。安图县城原来没有照相馆。我父亲有个朋友姓姜，叫姜显庭，我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他是个商人，开个小店，他还买了个照相机，我在他开的照相馆干了一年。那个照相馆没有电，是一间木头板子房，冬天也没有取暖设施。就这样，我在这个小照相馆一直干到 1945 年。

我父亲、母亲都是 1945 年去世的，两个人在一个月里相继去世。现在看来是克山病，那时候不懂，他们很快就都没了，只剩下我和弟弟。

弟弟学徒结束后，也没有工作。我们俩生活很困难，家里没有老人，也没有女人。我们住在同学家里的一间小房里，房中有一铺小炕，人家不要钱。我们就用这么大一口锅，做一顿苞米茬子吃好多天。

问：那您自己的家呢？

我们没有家。1945 年光复以前，我们没有自己的房子，真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



图为郎琦母亲郎张氏。这张照片摄于 1945 年，是母亲病重时郎琦为她拍摄的



1946 年，郎琦参加革命，任杨靖宇支队司令部文化教员

三、参加革命

问：您是怎么参加革命的？

郎琦：1945 年“八一五”光复了，安图县城里马上成立“维持会”，组织年轻人做保卫工作。没过多久，中国共产党的部队杨靖宇支队[1]来了，把原来的土匪武装剿灭了，我和弟弟、爱人一起跟着杨靖宇支队走了。

这支部队为什么叫“杨靖宇支队”呢？因为当地人不知道共产党，他们就借用了抗联领导人杨靖宇和李红光的名字，成立了共产党的部队——杨靖宇支队和李红光支队。李红光支队是朝鲜族队伍，这支部队很能打，战斗力很强，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贡献很大。杨靖宇支队后来改称“南满独立二师”。

问：谈谈您在杨靖宇支队的情况吧。

郎琦：1946 年 3 月，我们随杨靖宇支队到了通化，我在司令部当文化教员，弟弟在杨靖宇支队三团，我爱人在部队搞医务工作。那时候部队没有多少文化人，我念过 6 年书，就在政治部当文化教员。文化教员都做什么呢？主要是协助指导员管理“五大员”——司号员、警卫员、炊事员、通信员、饲养员。有的警卫员很厉害，是从延安过来的，是排级干部。

---

1. 杨靖宇支队成立于 1946 年 2 月。1945 年底，冀东部队一批干部到通化发展，成立一个独立团，而后胶东军区一个团进驻通化，与其合并成为通化支队。1946 年 2 月 19 日，在杨靖宇将军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上，辽东人民自治军通化支队被命名为通化保安司令部杨靖宇支队。部队后发展到 1 万多人，于 1946 年 12 月改名为南满独立二师，即辽东军区独立二师。

据《东北日报》1946 年 4 月 10 日报道《剿灭惯匪单秉义等部，杨靖宇支队解放安图县城》，杨靖宇支队于 1946 年 3 月 19 日解放安图县城。

我们部队曾经带着婉容等溥仪亲属一起行军。她们都是跟溥仪到通化大栗子沟的。那是1946年4月，我们部队离开临江，带着他们走。我们称婉容、李玉琴为“皇娘”，婉容当时就已病得很瘦。

我管过俘虏。1946年5月，共产党在东北战场还处于劣势的时候，国民党将领潘朔端率领一八四师在海城起义。那时候战场形势对我们很不利，我们又撤到临江，准备往延边去。这时候国民党军一八四师起义了，但这支部队中有一个团不服命令，这个团开到临江地区时发生叛乱，打了三天三夜，被我们剿灭了。[1]上级安排警卫连去管这些俘虏，最后把我派去了。我到了那里，先给他们讲话，接着要管俘虏们的吃饭问题，好容易弄到一些苞米，等烀熟了又没有碗筷，有个被俘虏的军官就拿大盖帽来盛，捡树棍儿当筷子。

1946年上半年，我在浑江地区的红土崖参加土地改革，搞“二五减租”。[2]当时红土崖的土匪还挺多。



1946年，郎琦和夫人关静在杨靖宇支队

1.《光明之路：原国民党一八四师海城起义始末》（中共鞍山市委党史征集委员会编，1987年）对该起义事件及其中某团叛变事件有记载。

2. 红土崖镇位于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西南部，1947年为临江县第八区，1956年为红土崖乡。

据《通化县志》（刘福德主编，通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记载，通化地区于1946年初开始进行“二五减租”，1946年7月转为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



东北解放后，农村土地改革也随即开展起来。这张照片拍摄于 1946 年 8 月，拍摄地点在吉林省浑江农村，拍摄的是以清算分地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改革动员会的现场。这张照片是郎琦用一台日本相机拍摄的。（郎琦摄）

解放战争开始以后，杨靖宇支队改称南满独立二师[1]，我奉命筹办招待所。当时部队的同志从后方到前线去，中途要休息、吃饭，需要有招待所。我的上级、通信科长袁德明[2]是位老同志，他带着我和一名饲养员在临江建立招待所。办招待所，哪有房子啊！我两天就搞定了。我拿了一支粉笔到老乡家，那时候老乡家没有现在这么多房子，能住对面炕就不错了。我一家一家地商量："你家对面炕还能睡五个人，我们独立二师的人再过来睡五个人吧！"吃饭呢，我看着一个人不错，就对他说："你就在这儿当炊事员吧！"我们的炊事员能做饭，能做萝卜条儿汤，虽然那萝卜条儿切得比钢笔还粗，再做点儿苞米面儿干粮、大白菜。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好吃的，过年时我们都没有饺子。就这样，我把招待所建立起来了。

后来部队被整编，我和弟弟就分开了。弟弟在三纵当文化教员，我在十纵。

---

1. 据刘西元的回忆（他曾任通化支队司令兼政治委员、辽东军区独立二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七军副政治委员）；"四保临江"期间（1946年12月至1947年4月），杨靖宇支队由地方武装改名为辽东军区独立二师。（根据《解放战争时期的通化》，中共通化市委党史研究室2000年，第842页）。辽东军区独立二师，又称南满独立二师。

2. 袁德明（生卒年不详），据说为"红军干部，曾担任重机枪连连长"（根据郑文祥《在通信保安司令部做通信工作的回忆》，转引自沈阳军区司令部通信部通信兵史编写委员会编《辽沈决战中的通信兵》，白山出版社1994年5月，第153页）。1946年2月任通化地区保安司令部通信科副科长，1948年6月至8月兼任辽宁省邮政管理局副局长。

四、东北画报社摄影训练班

问：当时为什么派您参加东北画报社摄影训练班学习？

郎琦：1948 年，东北民主联军分成很多纵队：一纵队、二纵队、三纵队……我是十纵队的，我弟弟是三纵队的。部队称“第四野战军”是进北平以后才改的。后来接到命令，东北军区要求每个纵队抽出 4 个人到哈尔滨学习摄影，要排连级干部。我当时是排级干部，也懂点摄影，便被选上了。

（一）来到哈尔滨

问：您是什么时候去学习摄影的？

郎琦：1948 年 4 月，打了开原以后[1]。当时长春、吉林都不能去——被国民党占着，我们从齐齐哈尔绕道去的哈尔滨。

问：当时是在哈尔滨什么地方上课？

郎琦：摄影训练班是东北军区委托东北画报社办的。上课地点在东北画报社，大楼在兆麟公园对面。李兆麟是抗联英雄，1946 年被国民党特务在哈尔滨杀害了，他的事迹我们都知道。东北画报社离江边很近，我们晚上去松花江边散步，能遇到很多生活在哈尔滨的白俄[2]，他们都穿着靴子，身上的香水味太

1. 辽宁省开原县是 1948 年 2 月 27 日解放的。东北民主联军十纵的二十九师、三十师和四纵的一个师合围，解放了新开原，这成为东北战场“冬季攻势”的重要一仗。（据《开原文史资料》第一辑，1985 年 4 月，第 18 页）
2. 白俄，指在十月革命成功、苏俄红色政权诞生后外逃的俄罗斯贵族及上层人物，也被称为白党、白色分子。他们中的很多人流落在中国东北一带。

浓了。

当时东北画报社办了两个训练班：摄影训练班和美术训练班。美术训练班里比较有名的学员有王冠[1]，后来他成了辽宁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我们两个班比赛唱歌，美术训练班的那些大学生不如我们会唱。我们都是军人，唱得整齐。



东北画报社美术、摄影学习班全体学员与画报社领导、教员合影（第四排右三为郎琦）照片由郎琦提供

学习时间很短，只有 4 个月。1948 年 8 月，我们返回原部队做记者，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在这段学习时期有两个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是炮兵司令朱瑞[2]，我见到他时，他

1. 王冠（1926- ），原名王冠安，吉林榆树人，1948 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曾任辽宁省文联副主席、辽宁省美术家协会主席。
2. 朱瑞（1905- 1948），江苏宿迁人，1924 年赴苏联，1928 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2 年到中央苏区，后参加长征抵达陕北。1948 年 1 月，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员。1948 年 10 月，在攻打义县的战斗中不幸触雷牺牲。



1950 年 10 月，郎慧在安东（今丹东）的留影，当时她与姥姥一起给入朝作战的舅舅送行

到摄影训练班来看他的学生。他个子高高的，面孔白白的，戴着眼镜，挺精神。后来没过多久（1948 年 10 月），他在义县战斗中踩到地雷牺牲了。还有一个人给我的印象很深，就是来自骑兵师的学员李基禄[1]，后来他转业到新华社了。学习结束后，我直接回到十纵队三十师，就是后来的第四十七军一四一师[2]。

问：您女儿郎慧是 1948 年出生的，那是您学习摄影之前吗？

郎：对，她是 1948 年 3 月出生的。我去哈尔滨的时候，还回安图县看她。当时很困难，我没有住房，女儿生下来就寄养在她姥姥家，家里没有牛奶，只能喂米汤。

我爱人本来在安图县医院当护理员，1946 年她和我一起参军。但她身体不好，在解放战争刚开始的时候离开部队。她也是满族，家里也挺困难，父亲过去在伪满税务部门工作过，因为脾气暴躁得罪了人就不干了，失业了。我爱人后来一直做医务工作。

（二）摄影训练班的老师们

问：您觉得摄影训练班教的最重要的是什么？

郎琦：学摄影，我记住了老师们说的话：“摄影

1. 李基禄（？- 2004），山东黄县（今龙口市）人，1947 年参军，1948 年入东北画报社摄影训练班学习，1950 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立有大功，1956 年回国后调到新华社摄影部工作。
2. 1948 年 11 月，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第三十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一四一师。

要表现啥？歌颂革命的先进，暴露敌人的罪恶。”这句话我记得最扎实，这么些年我一直坚持这点。

问：当时郑景康[1]给你们上课了？

郎琦：对，有郑景康。他是从延安来的，脾气挺暴，大高个儿。他编的油印教材，我现在还留着呢。

问：还有哪些老师？

郎琦：有个老师姓王，这个人总是羞答答的，我记不住他的名字。他过去是“满映”的，以前学过摄影。

齐观山[2]也教过我们，后来他也参加了北平入城式的拍摄。

还有陈正清[3]，他们都是从晋察冀边区来的，老资格。后来他和夫人何慧一起死了，非常可惜。

教美术的是张仃[4]，他就是后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院长。

讲写文报道的是刘白羽[5]，他当时是解放军的随军记者。1949 年我拍北平入城式时，刚好把他拍进照片里了。拍时没注意，后来冲洗出来，才发现画面中有刘白羽。

---

1. 郑景康（1904- 1978），广东中山人，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0 年在香港开设景康摄影室，1934 年在北平举办个人摄影作品展，1940 年赴延安，194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为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拍摄过肖像照。
2. 齐观山（1925- 1969），1941 年受教于沙飞，先后任《晋察冀画报》《冀热辽画报》《东北画报》的摄影记者，1949 年参加北平入城式拍摄，1952 年到新华社工作。
3. 陈正清（1917- 1966）是东北画报社摄影训练班第 1 期的班主任。湖南长沙人，1936 年自上海大同大学毕业后到延安，1945 年赴东北，1946 年 9 月任东北画报社采访科科长，1950 年任新闻摄影局摄影室主任，代表作有《开国大典》等，1966 年受到迫害，与妻子一起服安眠药自杀。
4. 张仃（1917- 2010），生于辽宁北镇，1934 年参加北平美术家联盟，1938 年到延安，1945 年任《东北画报》总编辑，1957 年任中央工艺美院副院长、院长等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主要设计者之一。
5. 刘白羽（1916- 2005），北京人，作家、记者，1938 年到延安，1944 年担任重庆《新华日报》副刊编辑，1946 年到东北担任随军记者。抗美援朝时期，他从朝鲜发回通讯报道。

老师里还有沙英[1]。

有位老师叫西虹[2]，讲新闻报道。他口音太重，听不太清楚。

当时中国共产党文化界的很多名人都在哈尔滨，华君武[3]、罗光达[4]、施展[5]，等等，我都见到了。那时长春、吉林都是国民党控制的地方，这些文化人都聚集在哈尔滨，我们近水楼台，得以见到这些名人。

当时摄影训练班使用刻蜡板油印学习材料。

（三）摄影训练班的同学们

问：您还记得摄影训练班里的同学吗？

郎琦：我参加的那期摄影训练班一共有 52 名学员。当时分 5 个班，我当过一班的副班长。

丁凤岭[6]，他后来转业到齐齐哈尔。

---

1. 沙英（1917- ），原名郭继纯，政治理论家，1946 年担任《东北日报》编委，1952 年调入人民日报社。
2. 西虹（1921- 2012），原名宁保禄，山西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延安八路军留守兵团烽火剧团宣传员、东北民主联军宣传部记者等职，后在解放军报社工作。
3. 华君武（1915- 2010），浙江杭州人，祖籍江苏无锡，1936 年在上海发表漫画作品，1938 年到延安。1945 年，参加东北文艺工作团随团来到东北，后担任《东北日报》记者。1949 年到北京，历任《人民日报》美术组组长等职。
4. 罗光达（1910- 1997），浙江吴兴人，1937 年在上海参加职业青年救亡团，1938 年到晋察冀边区，1945 年担任《东北画报》第一任社长。1948 年到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工作，1978 年任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
5. 施展，原名施景兰，画家，1931 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1950 年担任《东北画报》第三任社长。
6. 丁凤岭（1928- ），转业后担任《齐齐哈尔日报》记者，1962 年拍摄的《隆冬忙积肥》，被选送荷兰国际摄影艺术作品展览中展出并获荣誉奖，该作品 1963 年被选入《中国摄影优秀作品选》。

梁枫[1]。当时我们训练班52人，只有一个人是地方上来的，就是梁枫。我们都是穿军装的，只有他不穿。当时还有美术训练班，他们和我们一起学习，后来都成了美术界名人。

白振武[2]。他是三十八军的，这个人很有才华。我开始是训练班一班的副班长，后来转到三班当副班长，他在我那个班当学习组长。有一个老电影《奇袭武陵桥》，那就是他写的[3]。在老报纸上，你可以看到很多朝鲜战争的照片都是他拍的。因为他入朝比较早。我记得他最有名的一张照片叫《侵略者的下场》，拍的是一辆美国大卡车，门是打开的，上面有个白五星，那代表的就是美国，地上躺着美国黑人老兵。那不就是侵略者的下场嘛，不是死就是投降。

刘元塘。他后来改行了。

苗景阳[4]。他是我的组长，他是军部的。我们俩在朝鲜战场上一块儿负伤。我手术后又第二次去朝鲜，他没回去，就转到《黑龙江日报》搞报道。他是四十七军的，是我的正经上级啊！

周德怀。这个人我记不住了。



1948年8月，郎琦在东北军区摄影学习班学习时于哈尔滨留影。郎琦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十纵三十师摄影记者

1. 梁枫（1925- 2007），1949年任《东北画报》记者。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任随军记者。后任职《辽宁画报》，曾担任辽宁美术出版社副社长等职。

2. 白振武（生卒年不详），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第三十八军摄影记者，1949年2月至5月为《天津画报》供稿，后为《解放军画报》供稿。他在朝鲜战场拍摄的《侵略者的下场》等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1970年代担任军文化处处长。

3.1958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军教片《奇袭武陵桥》，是根据1950年11月24日朝鲜战场上发生的“奇袭武陵桥”事件拍摄的，执行这次奇袭任务的是白振武所在的三十八军。1960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又根据这一故事进行改编，拍摄了故事片《奇袭》。

4. 苗景阳（生卒年不详），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第四十七军摄影记者，1958年转业到黑龙江日报社担任摄影记者。

张举[1]。他后来在海军，再后来调到《解放军画报》工作。

张亚光。他是个大高个儿。

王云阶。他是四十军的，就是我弟弟那个军。他早就去世了。

李福丕。他后来去了《解放军画报》。

雪印[2]。他调到新华社搞军事报道，在吉林待了一段儿时间，后来去了云南。

薛锦涛。他回东北军区总部工作。

高鸿业[3]。我们俩是一个军的。

鲁众。他是七纵队的，拍北平入城式时我和他在一起，但后来再也没见过。

王春山[4]。他是三十八军的，我转业以后办《吉林画报》，把他要来一起工作。后来他得心脏病去世了。

陶天冶[5]。我最近找到他了。陶天冶给了我一本他自己写的书，说这些年吃了很多苦。他在朝鲜战争上采访时，腿让炮弹炸断了，流了很多血，快要死了，他还招呼救护员去救别人。救护员看他要不行了，和另一个伤员说："你等等，我先把他的事解决了。"

---

1. 张举（1930- ），第四野战军随军记者，参加了解放天津和广东沿海的战斗，后调入海军，1955 年 5 月由海军调入解放军画报社，1960 年转业山东。
2. 雪印（1923- ），江苏涟水县人，1944 年参加革命，1948 年担任第四野战军六纵队十六师摄影记者，1951 年调新华社摄影部，曾任新华社东北分社、吉林分社记者，1956 年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后任新华社昆明军区记者。
3. 高鸿业（生卒年不详），曾担任四十七军政治部宣传部新闻摄影员。
4. 王春山（1926- 1972），吉林桦甸人，曾担任三十八军摄影记者，后任黑龙江省伊春市画报社记者，1958 年调入吉林画报社，1960 年代末调入伪满皇宫博物院、吉林省博物馆，1970 年代又重新回到吉林画报社。
5. 陶天冶 (1930-)，山东长岛县人，中共党员。1947 年参加革命，解放战争时期在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第四十军任摄影记者，参加了第四野战军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的各大战役的采访报道。1950 年参加抗美援朝，在战场采访时负重伤，成为二等甲级荣誉军人。